

伯納德·曼德維爾論十八世紀 文雅文化與國家富強

陳建元*

本文探討的主題是十八世紀早期英格蘭重要作家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如何詮釋在當時社會影響力與日俱增的文雅文化(polite culture)。過往研究多集中於曼德維爾如何以嘲諷語氣批判與解構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與喬瑟夫·阿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理查德·史蒂爾(Richard Steele, 1672-1729)對文雅文化的主流意見，不過曼德維爾文雅觀中仍有一個待處理的面向，曼德維爾雖然反對沙夫茨伯里建立在人性光明面的文雅論述，但他並非全盤反對文雅文化，曼德維爾反對的是沙夫茨伯里等人缺乏根據地去美化文雅背後的虛飾、利益考量。本文最主要的貢獻在於：分析曼德維爾支持文雅文化的具體論證過程，探討他認為沙夫茨伯里式文雅在哪些層面上窒礙難行，以及他如何反駁乃至於超越沙夫茨伯里與史蒂爾等人。曼德維爾認為文雅文化可以刺激消費，從而引發連鎖反應，推動英格蘭經濟發展，進而提升國民生活水準，更多窮人得以溫飽，而英格蘭的人口亦將隨著經濟繁盛與日俱增。曼德維爾相信人口數量和國家的強盛與國民的福祉成正相關，文雅文化最重要的價值便在於使國家更為富強。誠如曼德維爾最具盛名(與惡名)的作品《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Bees*)之副標題「私人之惡，即公共之利」(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此一公共之利便是曼德維爾的終極追求，其具體內容便是讓英格蘭強盛富足，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而文雅文化便是達成此目標的重要條件。

關鍵詞：伯納德·曼德維爾、《蜜蜂寓言》、文雅文化、商業社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一、曼德維爾生平與文雅文化相關研究綜述

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於 1670 年出生在鹿特丹的醫生家庭，1691 年自萊頓大學畢業後取得醫學學位。1693 年前後，他移居英格蘭，在倫敦行醫。¹ 1705 年，曼德維爾發表一篇諷刺人類世界偽善的長詩〈嗡嗡蜂巢；或，邪惡變正直〉(*The Crumbling Hive; or, Knaves turn'd Honest*)，不過並未受到輿論界重視。1714 年，他為此詩加上許多長註腳、六篇評論和一篇長文〈道德德性起源之探究〉(*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Moral Virtue*)並且將書名改為《蜜蜂寓言：私人惡習即公共利益》(*The Fable of the Bees: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重新出版，不過仍舊沒有得到太多迴響。直到 1723 年，曼德維爾出版了《蜜蜂寓言》的新修訂版本，加入更多篇評論，以及批評英格蘭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主導的慈善學校的文章〈論慈善與慈善學校〉(*Essay on Charity and Charity-Schools*)和〈對社會本質的探索〉(*A Search into the Nature of Society*)兩篇長文。此版本問世後，米德爾塞克斯大陪審團(*the Middlesex Grand Jury*)於 1723 年對該書發出正式譴責，並且要求起訴出版商。大陪審團無法容忍曼德維爾著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曼德維爾在文中宣稱統治者為了維持公共秩序，應該正視妓院的實際效益，甚

¹ 曼德維爾的醫學思想可見其於 1711 年出版的《論憂鬱症和歇斯底里的激烈情感》。英文完整書名為：*A Treatise of the Hypochondriack and Hysterick Passions: Vulgarly Call'd the Hypo in Men and Vapours in Women; In Which the Symptoms, Causes, and Cure of Those Diseases Are Set Forth after a Method Intirely New. The Whole Interspers'd, with Instructive Discourses on the Real Art of Physick It Self; And Entertaining Remarks on the Modern Practice of Physicians and Apothecaries: Very Useful to All, That Have the Misfortune to Stand in Need of Either. In Three Dialogues* (London, 1711)。

至應該由政府正式設立公共妓院。²因此，大陪審團的起訴書中痛斥《蜜蜂寓言》破壞了公共秩序，其對「公共妓院的扭曲辯護以及牽強讚美，我們認為使得我們的國家步向墮落。」³曼德維爾對慈善學校運動的嘲諷，亦觸動了許多英格蘭作家的敏感神經。然而，大陪審團的起訴加上曼德維爾於1723-1724年間在《倫敦雜誌》(*The London Journal*)的自我辯護，反而讓英格蘭注意到《寓言》的讀者與日遽增。此時出現了為數更多的作家撰文駁斥曼德維爾，指控他關於德性(virtue)的討論皆出自虛偽的嘲諷。在短短五年之內，便有十本著作針對曼德維爾的《寓言》加以駁斥，喬治·柏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威廉·勞(William Law, 1686-1761)等知名作家皆在其列。⁴在此般爭議的推波助瀾下，《寓言》於1724年、1725年、1728年、1729年和1732年接連再版；《寓言》的第二冊(*The Fable of Bees, Volume Two*)也在1729年出版，其內容由六則對話組成。《寓言》所引發的辯論，不僅是1720-30年代英格蘭思想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所揭露的公共與私人利益之矛盾，也是下一代作家如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與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等人在各自論著中亟思回應與反駁之主題。⁵

² 「倘若某地沒有收費合理的妓女，我們有辦法設想良家婦女走在街上不會受騷擾嗎？由於這個原因，井然有序的城市的明智統治者，總會容忍一些妓院的存在，有些女人公開地在妓院工作，如同在馬車出租所工作的馬伕一樣。」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ed. F.B. Kaye, Vol. I, With a Commentary Critical, Historical, and Explanatory by F.B. Kaye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1988), 95-96.

³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85.

⁴ M. M. Goldsmith,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Bernard Mandevill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1.

⁵ 目前中文學界對曼德維爾生平與《寓言》論旨已有詳細討論，在此不再贅論。參見：陳國棟，〈從《蜜蜂寓言》到乾隆聖諭——傳統中西經濟

近二十餘年，關於文雅文化(polite culture)在十七世紀末以降的英格蘭、蘇格蘭的重要性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像是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以下簡稱沙夫茨伯里)、史蒂爾(Richard Steele, 1672-1729)、阿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乃至於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力，皆已有學者論述；本文所探討的主角曼德維爾，學界同樣已有眾多研究著作，然而學者泰半認為曼德維爾基於反對沙夫茨伯里伯爵人性觀和道德哲學的立場，自然會對文雅文化抱持不屑與嘲弄的態度。本文所要提出的論點則是，曼德維爾思想的核心是國家強盛，在這個最高思想方針的指導下，文雅文化推動奢侈消費、有助於人們和平相處的優點其實正是曼德維爾所措意之處。

以下將依序開展：第二部分回顧中文世界對曼德維爾的討論，以及英語學界對曼德維爾與文雅文化關係的研究進展。第三部分說明沙夫茨伯里、史蒂爾和阿迪生等人的文雅觀，以及曼德維爾如何從人性「自利」的現實層面來看待文雅文化，進而批判沙夫茨伯里對文雅(politeness)的詮釋。第四部分指出，經常被視為文雅反對者的曼德維爾，如何從文雅與惡習的關係，一步步推導出文雅具有促進社會和諧與商業發展的經濟效益。第五部分則進一步剖析曼德維爾主張文雅與奢侈消費可讓英格蘭在國際競爭中勝出的分析方法。曼德維爾認為，文雅帶來的奢侈消費有助提升一國之生產力，並且使國內的產業

思想與現代的意義》，《當代》，142(臺北：1999)，頁 44-61；陳正國，〈從利他到自律：哈其森與史密斯經濟思想間的轉折〉，《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0(臺北，2004)，頁 5-7, 14-19、陳正國，〈陌生人的歷史意義——亞當史密斯論商業社會的倫理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臺北，2012)，頁 791-795、陳禹仲，〈近代早期歐洲思想史中的曼德維爾〉，《思想史》，4(臺北，2015)，頁 275-312。

茁壯藉此雇用更多勞動力，在國際貿易成為一國國力強盛與否關鍵的十八世紀，這將使英格蘭國富民強，超越其他國家。最後，則總結曼德維爾對文雅文化的剖析與轉化，以及背後所蘊含的政治經濟學與國際競爭觀念。

中文世界注意到曼德維爾，最早是源自著名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於 1936 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之中譯本，該書引用了《蜜蜂寓言》；此外，196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關於曼德維爾的演講以及其他相關著作，也都引起大家的關注，⁶不過多數聚焦於曼德維爾的奢侈論。再者，陳國棟教授討論陸楫關於奢侈的言論時，也曾詳細介紹曼德維爾《蜜蜂寓言》中關於奢侈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辯證關係，這應該是中文學界最早細緻地探討曼德維爾思想的文章之一。陳國棟精要交代曼德維爾論揮霍有助於民生計與就業、促進社會經濟繁榮的過程；他也在研究中指出，曼德維爾正當化這些說法的最重要論證，在於他肯定虛榮心與貪婪等惡習(vices)能夠成就公共利益。⁷此外，陳國棟強調，曼德維爾不僅反對禁奢，更從正面肯定奢侈消費的益處，也就是增加消費可刺激「有效需求」(即人們有能力且願意購買的需求量)，如此一來，生

⁶ Friedrich A. Hayek 著，夏道平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頁 9。詳細討論見陳禹仲，〈近代早期歐洲思想史中的曼德維爾〉，頁 284 以及陳國棟，〈從《蜜蜂寓言》到乾隆聖諭——傳統中西經濟思想與現代的意義〉，頁 45。

⁷ 陳國棟，〈有關陸楫〈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學理問題——跨學門的意見〉，《新史學》，5:2(臺北，1994)，頁 159-179。當然，出版時間更早的經濟思想史著作中也對曼德維爾有簡短介紹，例如：黃曦峰編，《經濟學史大綱》(上海：開明書店，1933)，頁 81-82；于宗先主編，《經濟百科全書第二編：經濟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1986)，頁 213-214。

產者即使增加生產量，在市場上一樣能以理想的價格賣出，那麼生產者將會投入更多資本於其中，就業機會便會增加，失業人口隨之減少，國家便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國富而民強。這便是曼德維爾鼓勵增加消費以刺激經濟的理由。⁸

目前中文學界對於曼德維爾的經濟思想，多著眼於他對奢侈的辯護以及「個人之惡有助於公共之利」這個矛盾性的強調。本文在上述基礎上，從另外一個尚未被妥善研究的面向重新解釋，那便是十八世紀英格蘭文雅文化的脈絡。

英格蘭從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時代開始，「禮儀」(manners)一詞經常被用來指禮貌的行為，這種用法一直沿用至十八世紀。像是在 1690 年代，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強調兒童需要學習禮儀；阿迪生在 1711 年也寫道，所謂的禮儀指的是行為和良好的教養(good breeding)。十六世紀中葉，文明(civility)一詞興起，用來表示人的良好禮儀，取代了過去經常使用的禮貌(courtesy)。後者最初與宮廷中合宜的舉止有關，基本上屬於朝臣的特質；而文明則是公民的德性，是良好公民應當如何生活的準則。洛克在另一處亦指出，文明是對所有人的普遍善意和尊重，敦促每個人自律，不要在行為中表現出對他人的任何蔑視、不敬或忽視。⁹

在十七世紀晚期和十八世紀早期的英格蘭，「文雅」成為一個格外突出的關鍵詞，它適用於各種場合，具有廣泛的含義。從一開始，文雅就與紳士風度(gentility)一起出現且常相聯結。文雅被視為是於紳士和女士社交圈中的重要價值，體現出紳士和淑女的道地模樣。在社交

⁸ 陳國棟，〈有關陸桴〈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學理問題——跨學門的意見〉，頁 170。

⁹ Keith Thomas, *In Pursuit of Civility: Manners and Civil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0-13.

活動中，文雅支配著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既允許個體的差異，又能協調或整合彼此。文雅的社交生活有種種規範，它涉及一套管理身體和行為的方式，在理想情況下，通過此種取悅他人的藝術，可以消除等級、性別、政治和觀點的歧異所帶來的衝突，當時的文人多致力於使英格蘭社會的語言、社交和待人接物等各方面都能達到這種水準。¹⁰

「文雅」有別於「文明」之處，在於其與商業社會的興起關係密切。誠如學者波考克(J. G. A. Pocock)所指出，1688年革命後所帶來的政治自由，特別是政治的穩定以及宗教寬容，使得英格蘭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顯著改善。文雅是屬於現代商業社會的美德，因此波考克評論道：「商業是文雅之母」。¹¹當然，即使是最樂觀的思想家也對任何誇大商業勝利的說法表示懷疑，不過揆諸時人關於文雅的論述，他們確實企圖藉此重新定義過去的德性、禮貌等概念，使之適用於一個全新的商業社會。然而，文雅並不是簡單的經濟現象，它在分析和重新定義公共事務時，很顯然是一套政治方案。文雅這個概念無疑為社會群體創建了一個有別於國家制度的政治角色。無論是文人或媒體對於文雅的論述，都是以人類的社會性為基礎，探討人所應有的道德觀與宗教觀，並將這種觀點透過期刊、報紙等媒介推廣到社會。¹²這些期

¹⁰ Lawrence E. Klein,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4.

¹¹ J. G. A. Pocock, "Cambridge Paradigms and Scotch Philosopher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ivic Humanist and the Civil Jurisprud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Social Thought," in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s.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41.

¹² Lawrence E. Klein, "Liberty, Manners, and Politenes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2:3 (September, 1989): 588-590.

刊文章既是闡明觀點的手段，有時期刊文章本身便構成了作者試圖創造的社交空間。

除了政治意義，文雅還包含更寬廣的面向。文雅可以促進社會的進步和完善，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透過對話。文雅文化不僅反對當時英格蘭政治上黨派分裂、宗教上各教派歧見紛出的狀況，還提出了一個更加和諧的理想。儘管不能說它成功解決了所有問題，但它確實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來理解和應對時代的焦慮。文雅的理想在十八世紀的英格蘭隨著時間推進而層層深化，其語言和價值滲透到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作家寫作文雅文學(polite literature)，¹³作曲家譜寫文雅歌曲(polite songs)，¹⁴而公眾則可造訪文雅的娛樂場所。¹⁵在在顯示出文雅文化的涉及面向遠比文明和禮儀來得廣泛許多。

¹³ 學者凱斯·湯瑪斯指出，文雅文學追求將民謠與民歌等大眾文化要素排除在文學以外。見 Keith Thomas, *In Pursuit of Civility: Manners and Civil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45. 文雅文學的一些代表性刊物有：伊麗莎·海伍德(Eliza Haywood, c. 1693-1756)的《女性旁觀者》(*Female Spectator*, 1744-6)、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84)的《漫步者》(*The Rambler*, 1750-2)、愛德華·摩爾(Edward Moore, 1712-57)的《世界》(*The World*, 1753-6)和亨利·麥肯齊(Henry Mackenzie, 1745-1831)的《鏡子》(*The Mirror*, 1779-80)，請見 Philip Carter,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Britain, 1660-18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34.

¹⁴ 歌曲內容多著重美德或是精緻品味，可參見當時的文雅歌曲合集：*The Muses Holiday: Or, the Polite Songster. Being an Elegant Collection of the Most Favourite New Songs, Etc* (London, 1757); *The Nightingale. A Choice Collection of New and Polite Songs* (London, 1770).

¹⁵ 像是沙夫茨伯里便指出劇院和集會廳(assembly)就屬於這類日益商業化的文雅娛樂場所，見 John Brewer,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7), 89-90; R. H. Sweet, "Topographies of Politenes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2 (2002): 356.

沙夫茨伯里、史蒂爾與阿迪生是奠定十八世紀初期文雅文化基調的重要作家。沙夫茨伯里的作品以及《閒談者》(*The Tatler*，史蒂爾主編的期刊，該期刊發行的中後期有不少期數是由阿迪生撰寫，發行時間為 1709-1711 年)、《旁觀者》(*The Spectator*，阿迪生與史蒂爾共同主編的期刊，發行時間為 1711-1714 年)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同時也是曼德維爾在《寓言》中批判的對象。

《旁觀者》雜誌在整個十八世紀的發行量難以估計，因為個別文章經常被重印在教科書、行為手冊、散文集和純文學作品中。它在 1711 年 10 月至 1714 年間共出版 635 期，每期只需要一便士，其中內容泰半是針對禮儀、道德和文學的評論。《旁觀者》一問世便獲得成功。在第十期中，阿迪生自己吹噓每天分發了三千份，並聲稱每份有二十名讀者，許多現存史料都印證了他的說法。¹⁶

《旁觀者》所說的文雅是什麼意思？它是一種哲學，一種獻身於其中的生活方式，讓人瞭解自己和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此外，它還包含了禮儀與道德等各方面，是一個完整的行為體系。文雅的目的是為了適應現代生活的複雜性，用相互寬容和理解取代政治熱情和宗教偏執。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是鼓勵人們多與他人交談和打交道，透過這樣的社會互動使人從中學習調節自己的強烈情感(*passions*)並培養良好的品味，使人明白什麼行為舉止方才符合公共利益和普遍利益。可以說，文雅是一種主張學習自律並採取高雅且適度社交的價值觀。¹⁷

不少學者業已注意到曼德維爾對沙夫茨伯里以及史蒂爾等人的批判，並且從不同角度來解釋與評價曼德維爾的說法。在相關研究中，

¹⁶ Hazel Wilkinson, "The Complete Spectator: A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in *Joseph Addison: Tercentenary Essays*, ed. Paul Dav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182.

¹⁷ Markku Peltonen, *The Due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ivility, Politeness and Hon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07.

學者保羅·薩加(Paul Sagar)指出,曼德維爾的批判是受到霍布斯的影響,這體現在曼德維爾認為人類之所以組成社會,與人類內心的自賞與自愛密切相關。易言之,人類天生並不具合群性(sociableness),不過他們根據現實生活經驗體認到,單憑一己之力無法生存,基於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才決定與他人共組社會。¹⁸因此,沙夫茨伯里所主張的「人天生就具有合群性,並且天生對於社會中的其他人懷抱著利他心(charity)」,在曼德維爾看來毫無根據,這「往往會誤導人的思考,並且是出於妄想。」¹⁹學者珍妮佛·赫特(Jennifer Herdt)則留意到,曼德維爾雖然批評沙夫茨伯里,但是他並不反對禮貌(good manners)本身,因為曼德維爾認為人類社會的存續和繁榮皆維繫於其上。赫特指出,曼德維爾對沙夫茨伯里文雅理論的批判,其中關鍵在於:沙夫茨伯里沒有覺悟到,驕傲和虛偽是不可能從社會中消除的。相對地,曼德維爾則是主張吾人應大方坦承:文雅文化乃是出於人類的自愛,而不是出於個人對他人福祉的考量。其中更重要的是,人類出於自愛心而追求的文雅文化,實際上正是推動人類社會與文明進步的巨大力量。換言之,人類的自愛心透過文雅文化無心插柳地推動、改善了公共福祉。²⁰赫特的論述重點在於:曼德維爾並不反對文雅文化,他反對的是沙夫茨伯里將文雅歸諸於性善論以及人類天生具合群性的說法。

至於曼德維爾對《旁觀者》文雅觀的批評,學者安東尼·波拉克(Anthony Pollock)指出,曼德維爾點明在阿迪生式文雅價值的背後,有出

¹⁸ Paul Sagar, *The Opinion of Mankind: Sociability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from Hobbes to Smi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85-86, 91-92.

¹⁹ Anthony Pollock, *Gender and the Fictions of the Public Sphere, 1690-1755*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55-74.

²⁰ Jennifer A. Herdt, *Putting on Virtue: The Legacy of the Splendid Vic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278-279.

自利益考量的現實面——文雅並不如阿迪生等人所說，是人性中的既有特質，而且文雅生活其實是要引導其讀者不去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甚至被動地服從權威。學者墨利斯·高史密斯(M. M. Goldsmith)則留心曼德維爾對於史蒂爾的回應。史蒂爾在《閒談者》中主張的文雅雖不排斥商業，然而他在此刊物的許多文章皆指出，世上沉溺於消費之人，與行屍走肉無異。曼德維爾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於1709年在期刊《女性閒談者》(*The Female Tatler*, 1709-10)上所發表的文章，便是要回應史蒂爾對恣意消費的批判。高史密斯指出，曼德維爾認為人類在現實世界中重視物質幸福更甚於德性，因此奢侈或許有違過去公民人文主義的勤儉觀，卻能激發科學與技藝進步，而這遠比前者來得重要。這種價值觀將取代公民人文意識型態的古典德性，成為新出現的商業社會的主流價值觀。²¹高史密斯的一個重要論點是：曼德維爾不認為享受奢侈品的行為有礙國家繁榮。²²反之，曼德維爾評價奢侈品時所採取的是一種文明演化的觀點：文明程度愈高的社會，便會有愈多人盡情享受不具實用性的各樣奢侈品。對此，曼德維爾認為奢侈品文化愈發達之國家，其國力也必然更加強盛，他指出，住在「充滿豪華時髦傢俱的那種富麗堂皇的房子裡」以及「享用佳餚美酒」無疑有助公共福祉，因此史蒂爾的文雅觀在這一點上是錯誤的。²³

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指出，文雅與奢侈品在曼德維爾的思想中乃一體之兩面，²⁴曼德維爾對於文雅文化的擁護，必須參照

²¹ M. M. Goldsmith, "Liberty, Luxur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ed. Anthony Pagd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25-252.

²² M. M. Goldsmith, "Liberty, Luxur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245.

²³ Bernard Mandeville, *By a Society of Ladies: Essays in The Female Tatler*, ed. M. M. Goldsmith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9), 104.

²⁴ 學者馬庫·佩托能(Markku Peltonen)業已觀察到曼德維爾在《致迪翁的一

他對奢侈品的論述，乃至整體政治經濟思想脈絡來加以考察。曼德維爾的奢侈品論述、思想淵源與論戰背景，學界已有廣泛且深入的討論。²⁵然而，關於曼德維爾如何從奢侈品及其所創造出的產業與就業機會來評價與支持文雅文化，仍有待進一步研究。²⁶對曼德維爾而言，奢侈品是一個國家是否能具備足夠物質資源來抵禦敵國侵略威脅的關鍵，²⁷而文雅由於可以促進奢侈品，因此是提升國家力量的要素。本文將指出，曼德維爾支持文雅文化的終極原因在於一來可以刺激人民的消費；二來文雅文化強調尊重他人、反對暴力，可避免國家內耗。這都有助於一國在政經力量上更為強盛，集體福祉也因此更有保障。有別於《旁觀者》，曼德維爾基於國家富強的原因支持文雅文化，這充分體現在他對文雅實際效益的辯護上。

封信》(*A letter to Dion*)和《對榮譽起源的探究》(*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Honour*)中都提出文雅和奢侈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不過佩托能主要關注的是曼德維爾的榮譽觀，與本文要探討文雅的政治經濟意涵不同。見 Peltonen, *The Due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299-300.

²⁵ 僅舉數例代表性研究：Christopher J. Berry, *The Idea of Luxury: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Istvan Hont,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Debate on Commerce and Luxu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ed. Mark Goldie and Robert Wokl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77-418; Edward Hundert, "Mandeville, Rousseau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antasy," in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bates, Desires and Delectable Goods*, ed. Maxine Berg and Elizabeth Eger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3), 28-40.

²⁶ 雖已有部分研究者注意到兩者關聯，然而尚未有研究將此作為核心主題加以討論，但可參見：Martin Otero Knott, "Mandeville on Governability," *Journal of Scottish Philosophy* 12:1 (March, 2014): 19-49.

²⁷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23.

二、對沙夫茨伯里式文雅觀的批判

沙夫茨伯里的著作公認為構成了十八世紀英格蘭文雅文化的理論基礎。要言之，他的文雅哲學首先重視人如何砥礪自己的內心，並且將道德與美學合而觀之，認為道德行為讓人感到賞心悅目，道德善行本身便是美的事物。第二，其文雅哲學重視外在行為，主張人在舉手投足之間都須謹言慎行。最後是將上述內外兩方面的修養應用在社交往來之中：他相信人與人在互動的過程中，無論是自己或是他人都會獲得提昇。沙夫茨伯里企圖扭轉英格蘭自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復辟以來宮廷揮霍放縱所造成的社會道德低落，他鼓吹人們進行文雅的社交活動。例如在城市中的俱樂部或是茶會(tea-table)中自由且有禮地交談與辯論，並且透過他人的意見與目光來修養自我的身心。²⁸

沙夫茨伯里之所以擁護文雅文化，一部分原因出於改革宮廷式價值觀的目的，但正如學者已指出的，其作品內容仍帶有濃厚的鄉紳貴族色彩，特別表現在他對於商業貿易以及商人群體的著墨甚少。²⁹真正將商業帶入文雅文化討論的，是阿迪生與史蒂爾主導的雜誌《閒談者》(*The Tatler*, 1709-1711)與《旁觀者》(*The Spectator*, 1711-1714)。沙夫茨伯里與後者的差異在於，他的讀者很大比例是相對富有的鄉紳地主，而後者大多是以專業技能維生的中層人士(*middling sort*)。阿迪生等人著作的背景設定主要是日常生活的場所，而沙夫茨伯里著作中談話所發生

²⁸ G. J. Barker-Benfield, *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 Sex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38-65.

²⁹ Nicholas T. Phillipson, "Politics, Politeness and the Anglicisation of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Scottish Culture," in *Scotland and England: 1286-1815*, ed. Roger A. Mason (Edinburgh: J. Donald, 1987), 233-234.

的地點則多半是限定身份、一般民眾不得其門而入的場所。³⁰不過整體而言，阿迪生與史蒂爾認同沙夫茨伯里的目標：他們希望以文雅舉止，以及有序、互相尊重的社交互動來改進英格蘭的公共生活，他們相信，以更開放的態度來評價英格蘭的快速商業化，更密切地關注商業活動與都市生活，用心經營因為商業行為而衍生出的大量人際接觸，凡此將可與文雅文化形成良好互動的正向循環。

在文雅觀念方面，阿迪生與史蒂爾是沙夫茨伯里理想的宣揚者，他們主編的《旁觀者》主張，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與互動，必然受到社會身份、文雅、禮貌等等的制約，因此人在使用語言時應當留心去遵守節制(moderation)原則，並且控制住自我的驕傲，尊重他人的判斷與意見。阿迪生等作家注重人們如何將文雅價值內化到自我行為與語言中，也就是說在習慣謹慎行事、文明對待他人之後，理性與常識(common sense)亦將被文雅之士內化，藉此讓人控制住本性中的利己心，培養人們對於個人與整體社會利益，更周延與寬廣的思考。³¹

然而，曼德維爾基於其人性觀以及政治經濟思維，對於上述沙夫茨伯里式的文雅觀頗多批評。曼德維爾最先是在 1723 年出版的增補版《寓言》直接挑明沙夫茨伯里的觀念有待商榷。他在新收錄於此版本的評論寫道，某位伊比鳩魯主義者(Epicurean)會引用「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話來反對我，並會告訴我：人類可以是善良的並且喜好與他人往來，完全毋需對抗與生俱來的本性。」同樣在 1723 年收錄於第二部

³⁰ R. H. Sweet, "Topographies of Politenes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2 (2002): 356.

³¹ Nicholas T. Phillipson, "Propriety, Property and Prudence: David Hume and the Defence of the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eds. Nicholas T. Phillipson and Quentin Skinn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8-309.

分的長文〈對社會本質的探索〉則稱沙夫茨伯里的觀點是對人類的「極高讚揚，而且認為人可以通過些許的激情來激發崇高天性中最高尚的情感……但是相當可惜的是，沙夫茨伯里所說的這些並不正確。」³²曼德維爾在 1729 年出版的《寓言》第二冊同樣提到，世界上並「不存在沙夫茨伯里伯爵所說的那些關於利他、人道或其他合群德性(social virtue)的例子」，曼德維爾直陳：促使世人達成各種事情的驅動力其實是虛榮心(vain-glory)。某人行為舉止愈是彬彬有禮，其心中之自傲實則愈是膨脹。一個人若是在交談時能讓他人感到愉悅，是因為他費盡心機去掩飾自己內心的自負，而他之所以要如此克制自己天性，則是因為社會的主流意見認為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絕不會表現出這種自負。³³曼德維爾對沙夫茨伯里的批評一直延續到他於 1732 年出版的最後一部著作《致迪翁的信》(*A Letter to Dion*)，他在其中寫到：「我與尊貴的沙夫茨伯里伯爵之意見截然不同……我們對於社會的起源等等許多事情也抱持著迥異的看法，特別是關於人類為何是社交性生物，為何與其他動物不同。」³⁴

曼德維爾對於《閒談者》、《旁觀者》的文雅觀自然也抱持批判態度。³⁵他在《寓言》第一冊便寫道，「無與倫比的史蒂爾爵士」以

³²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24.

³³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ed. F.B. Kaye, Vol. II, with a Commentary Critical, Historical, and Explanatory by F.B. Kaye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1988), 65.

³⁴ Bernard Mandeville, *A Letter to Dion, Occasion'd by His Book Call'd Alciphron, Or the Minute Philosopher* (London: J. Roberts, 1732), 47.

³⁵ 關於曼德維爾在《女性閒談者》對《閒談者》具批判性的介紹，見 Thomas A. Horne, *The Social Thought of Bernard Mandeville: Virtue and Commerce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8-12.

其「華美詞藻闡述人類天性之卓越」風靡了許多讀者，他們無不陶醉於史蒂爾的「樂觀以及文雅詞句。」³⁶然而，曼德維爾在緊接下來的段落便批評史蒂爾所謂的文雅舉止不僅與理性、常識無關，亦非如他所宣稱的控制住了自利心，反而正是受到自利心所左右。曼德維爾用一對姊妹的故事來說明以上這點：在某個鄉紳家庭中，大人們極力稱讚一位尚在學步的年幼女孩走路如何地優雅，發出誇獎之詞的所有人皆明白這是過分溢美(曼德維爾說這是令人厭惡的謊言)。然而，這位妹妹的自愛心顯然被這些讚頌所滿足，所以她「培養出自己淑女風度的速度，比那些未被阿諛奉承的小姐要快得多。」³⁷而故事中的姊姊，起初則因為長輩皆齊聲稱讚妹妹而感到遭受冷落，但是長輩悄悄告訴深感委屈的她，對妹妹的這些稱頌只是種居高臨下的假意殷勤，其實大人們只是在利用稚兒的無知。姊姊聽完後便也心滿意足地開始稱讚妹妹，因為她得知自己躋身於大人哄騙妹妹的行列後，自傲心也得到了滿足。³⁸曼德維爾講完這個故事後總結道，所謂的文雅行為並不如史蒂爾等人所說是出於高貴的動機；史蒂爾等人所認定的文雅社會以及成員之間的理想互動，無非是參與者滿足彼此的自愛心使然。³⁹

曼德維爾與阿迪生等人一樣，皆對於文雅行為的表現方式有所描述。不同之處在於，曼德維爾並不像阿迪生一樣讚許談話及交流，而是以其一貫的手法揭露文雅行為後面充滿了個人利益考量。他反覆

³⁶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52-53.

³⁷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53.

³⁸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53.

³⁹ 又如曼德維爾在《寓言》另一段落所言：「人類組成社會既不出於愛也不出於恨，唯一的原因就僅僅是為了自己。」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78.

強調，當我們與他人「交談」時，「我們想的都是如何強化自身的利益」，要麼是物質上的，要麼是滿足我們可以裝出大公無私般的心理。曼德維爾指出，沙夫茨伯里等人錯把這種與他人結識、交流的能力「膚淺地」歸因於人類的利他心，⁴⁰他們認為人們生性是良善的，而且天生善於交際，人們不僅在物質生存上依賴他人，情感上也會從人際互動中得到滿足。是故「為公眾利益和個人利益著想不僅是一致的，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因此，道德的正直或德性必然是每個人的優勢，而邪惡必然是每個人的傷害和劣勢。」⁴¹沙夫茨伯里更進一步從積極正面的角度定義道，德性是對公共利益的無私追求，這是受到道德意識所認可的：「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去熱愛眾人，去鑽研普世的善，去促進全世界的利益，這無疑是最高尚的善。」⁴²

阿迪生同樣也相信文雅行為直接反映出行為者內心的素養，他在《閒談者》中指出：

具有高雅和高尚思想(noble minds)的人看到那些因其德性、知識或對國家的貢獻而值得尊敬的人的品格受到錯誤的評價，並由於歪曲事實而成為被揶揄的對象時，都會感到震驚。⁴³

然而，曼德維爾則認為，人類是克制了本能才裝出文雅外表的。人類固然喜歡群居結伴，但這並非出自天性，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for his

⁴⁰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43.

⁴¹ 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ed. Lawrence E. Kle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3.

⁴² 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20.

⁴³ Richard Steele and Joseph Addison, *The Tatler*, ed. Donald F. Bond, Vol. 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155.

own sake)。」⁴⁴針對阿迪生上述引文，曼德維爾在 1710 年時為期刊《女性閒談者》(*The Female Tatler*)所撰寫的文章中，借當中角色露西姐(Lucinda)之口反駁道：

對人類社會最偉大、最直接的恩人，正是那些盲目的命運之神手下的寵兒，他們只顧著取悅自己，學習創造新的慾望……人們之所以生活在一起，不是因為某些特有的優良素質或天生的德性(*innate virtue*)，而是因為他們的需要、慾望和每個人對自己的巨大之愛。⁴⁵

另外，在避免衝突的部分，正如沙夫茨伯里在《論人、風尚、輿論、時代的特徵》(*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中所說，「我們彼此打磨，通過某種善意的切磋來修磨掉我們的銳角和粗糙面。」

⁴⁶阿迪生等人接受此說，主張人們在談話與往來中會互相理解容忍，進而打磨了個人心性中的稜角，讓人人都成為更好的人。而曼德維爾其實也有相應的觀察，只是他一如往常使用了更具煽動性、爭議性的例子：賭桌。曼德維爾指出，牌桌上贏家產生的強烈情感，往往是種感激；只要輸家不發火，贏家往往還會產生歉疚之情。贏家始終在討好輸家，情願萬分謹慎，表現出極文明的風度，來表示贏了他的錢實在不好意思。後者則悶悶不樂，或許還會咒罵咆哮。不過，只要輸家的言談舉動並非故意與贏家作對，贏家能獲得賭資而又不致得罪輸家，因此不與輸家結怨。⁴⁷在阿迪生等人的筆下，人們隱藏自己的情緒不

⁴⁴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41.

⁴⁵ Bernard Mandeville, *By a Society of Ladies: Essays in The Female Tatler*, 99.

⁴⁶ 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ed. Lawrence E. Kle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1.

⁴⁷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78.

會是因為怕自己遭受傷害與不測，而曼德維爾彷彿是要道出他們沒說出口的話。人們之所以文雅、容忍，以最美化的說法來解釋，是因為修養心性；但是在曼德維爾看來，這種文雅固然有其冠冕堂皇之處，但究其根本還是在於實用性。因此，賭桌上的贏家經過一段時間，不再擔心輸家報復後，這種「自我保護的顧慮」一旦消失，那麼「贏家便會立即安於贏得的利益」。⁴⁸

曼德維爾在《寓言》中說道：「在社會中生活在一起的人變得善於交際(sociable)」。⁴⁹他認為人們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才變得善於交際。因此，社交能力乃至於文雅是一個隨著時間逐漸累積的學習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逐漸學會從與眾人的共同生活中獲得最大好處。

必須注意的是，曼德維爾並不反對人們聚集往來，也不反對文雅文化，他所批評的是將其過分美化到脫離現實。人類之所以結伴並組成社會，主要有兩個理由，都與自利密切相關。首先，人們渴望從夥伴那裡得到稱頌，藉此證實自我評價是正確的。人們或許偶爾會協助別人，但是這樣做的目的是讓自己得到奉承。其次，人們意識到只有通過交往，他們的物質需求才能得到滿足。曼德維爾有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話說明了這點：「人的社會性出自於以下這兩者：即其慾望的多樣性，以及在滿足慾望的努力中不斷遇到的阻礙。」⁵⁰曼德維爾重視文雅的現實意義，同樣體現於另一個例子。曼德維爾強調，十八世紀時，軍人在戰場上得勝的關鍵不在於強健的體魄或是以粗衣陋食來砥礪心靈，最重要的是他所擁有的軍火。他指出一些軍隊指揮官儘管鎮日宴會，但若是他們對於戰術有深厚造詣，並且握有先進武器，依然

⁴⁸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78.

⁴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89.

⁵⁰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44.

可以百戰百勝。同樣地，就算他們耗費許多心思打扮自身的體面外表，並講究娛樂活動中的文雅(Politeness of Entertainments)，也與戰場上的能力不衝突。⁵¹

三、文雅與商業社會

曼德維爾在 1729 年所出版的《寓言》第二部的第三則對話中，有這麼一段霍拉修(Horatio)詢問克列奧門尼斯(Cleomenes，《寓言》中的支持曼德維爾主張的角色)文雅在人類社會的起源。克列奧門尼斯以一種進化的眼光指出，⁵²在文雅尚未出現前的未文明化(uncivilized)社會中，人們完全不試圖隱藏他們對自身的愛遠大於對別人的愛。最後的情況就會演變成社會的人群之間無法容忍彼此，這個共同體自然是紛擾不斷永無寧日。⁵³而根據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來觀察，克列奧門尼斯說道：

我想懇請你思考的第二件事就是：就所有人類而言，這種自賞可能造成的不便對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人類具備相當高的智能，酷愛並且會奮力追求自身**最大的安逸**。我認為，只要恰如

⁵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122.

⁵² 關於曼德維爾的進化發展觀，請見 Nathan Rosenberg, "Mandeville and Laissez-Fai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4:2 (April/June, 1963): 185-187; F.B. Kaye, "Introduction," in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Vol. I, lxx-lxvi; Andrea Branchi, "Honour and the Art of Politics," *I castelli di Yale online*, 6:2 (2019): 30-34. 學者馬康·傑克(Malcom Jack)則特別注意到曼德維爾對於早期人類逐漸社會化進程的極長時間，並且指出其上承十六、十七世紀歐洲旅遊敘事中對於部落人群的描述，並下啟後來蘇格蘭啟蒙的推測史學(conjectural history)，參見 Malcolm Jack, *Corruption & Progress: The Eighteenth-Century Debate* (New York: AMS Press, 1989), 55-62.

⁵³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38.

其分地斟酌這兩件事情，你便會發現：自賞必然會激起煩惱與不安，無論中間經過多少次艱辛但失敗的嘗試來加以挽救，最終都勢必造就出我們所說的重視禮節和文雅。⁵⁴

易言之，人們透過觀察自己歷代祖先的事蹟將會明白：若是一個社會當中不存在對自愛、自利的束縛，那麼該社會將會陷入永無止盡的混亂與內耗之中。不過，要再次強調的是，曼德維爾認為一個社會的領導者固然要設法防止自愛、自利這些強烈情感與本能危害社會，但是自愛、自利完全不應該令人感到羞愧，因為一旦統治者能夠妥善地疏導和管理這些情感，將極有助於他們的統治，並使國家日益興盛。⁵⁵

為了追求「最大的安逸」(見上引文粗體部分)，人類歷史上愈到了晚近的階段，不同社會中的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地都強烈地意識到：唯有當每個人能夠正視他人跟自己都有相同需求時，個體企圖獲得他人尊重的慾望方能被滿足。易言之，人類是從歷史累積的經驗中體認到，若要滿足自己的慾望，那便必須要在社會中與他人交際應酬。這種體會再經過「許多世代的積累」，⁵⁶最終的成果便是禮節與文雅。由於商業社會是由「人們之間的互惠所組成的」，文雅便是商業社會中，「當人們彼此有需求時，可以從其他人那裡獲得幫助(reciprocal services)」的手段。⁵⁷由於人的慾望隨著文明進展不斷膨脹，每個人需要他人協助之處自然與日俱增，因此更需要學習文雅，方能與他人和平共處乃至友好往來。曼德維爾指出，文雅這個價值以及背後的一套文化不是由一個人在一時之間建立起來的，相反地，這是「人們在漫長時間中

⁵⁴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38. 粗體為筆者所加。

⁵⁵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91.

⁵⁶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319.

⁵⁷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349.

逐漸形成的。」⁵⁸正如他在〈道德德性起源之探究〉一文所言：

那些滿腦子只想滿足個人慾望的人，會不斷地受到其他同樣追求此目標的人之阻擾，因此即使是這種人也將清楚體認到：只要他們抑制自己的天性，或者用較為迂迴的方式來滿足自己之性向時，他們將可避免許多災難。⁵⁹

當這種抑制、偽裝的過程達到相當程度的成熟時，這些人將「變得十分厚顏無恥」，不但可以完全隱藏自賞與自傲，還能佯稱他人優於自己。這樣的人若純就外觀而言，「顯得十足謙恭有禮」。⁶⁰更重要的是，這群人將會發現，不真誠一旦達到如此成熟的程度，居然可以帶給自己不少好處，於是他們自然而然會將這一套虛飾傳給自己的子女：

人會將父輩的知識、生活經驗，加上年輕時學得的東西都傳授給子孫後代。每一代人由此學會的東西，都必定比前代人學到的既多且精。依此下去，經過兩三個世紀，禮節必將臻於完美。⁶¹

要言之，人們隱藏自我慾望，透過遵守文雅與禮儀的規範來相互協助，讓彼此的生活變得更加舒適：

人可以恪守禮節，拚命使自己顯得有教養，而同時又根本不把上帝的法律放在眼裡。表現出彬彬有禮與心地邪惡並非互不相容……人可以用文雅有禮、衣著考究裝扮出對年老雙親的恭讓。⁶²

人們基於偽裝的文雅而相處地更為愉快，彼此的慾望也因此得到更大

⁵⁸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39.

⁵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47.

⁶⁰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45.

⁶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45-146.

⁶²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281.

的滿足：「一個極自傲的人可以將其自賞隱藏起來，不被人發現，而且他從極力隱瞞這種強烈情感中所得到的滿足感，反而比在世人的面前完全放縱自己的那種人要來得更大。」換句話說，「這些文雅之士以最嫻熟的技巧掩藏自傲之時，亦是他最能取悅自身，滿足自傲心之時。」⁶³然而，誠如本文在前言所申明的，曼德維爾談論文雅時念茲在茲的是社會整體福祉(common good)以及國力強盛。所以，滿足慾望並非曼德維爾所措意之處，而是「對社會整體有益之行為」所連帶產生的優點。⁶⁴

曼德維爾認為這種偽裝的文雅抑制甚至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暴力。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人性中「令人憎惡的自傲」(odious part of pride)被抑制，人類將注意力轉向衣物、裝飾品、僕人、傢俱、房舍和頭銜上頭，並且獲得心理上的滿足感。⁶⁵相反地，若是沒有這種文雅教化，上百名男性野蠻人不受任何限制地聚在一起，不到半個小時內，一定會發生激烈的爭鬥。⁶⁶所以，「禮貌」這種社會風俗在維持人群和平相處上具有相當的實用性。此外，禮貌(文雅)並不強制眾人必須在道德上堅持高尚、刻苦的自我克制，因此可以讓自私、性惡的人們在社會中既透過追求雅事來滿足慾望，也可彼此和睦相處。這種隱藏在文雅、禮貌表相下的自傲，可以約束一些破壞社會的不良行為。所以這種將真實自我偽裝起來的習慣與「文明往來」(civil commerce)被曼德維爾等同視之，用來指陳禮貌與文雅在商業社會中引導人們行為更和諧的作用。⁶⁷曼德維爾因此指出，文雅便是人類文明社會發展過

⁶³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79.

⁶⁴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48.

⁶⁵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27.

⁶⁶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32.

⁶⁷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49.

程中，道德規範形成的指標。

在曼德維爾的論述中，自愛(self-love)與自賞(self-liking)是有所區分的。簡言之，自愛與個人性命之保存較密切相關，而自賞則是感到自己凌駕於他人的優越感：

自愛能會驅使人為自己的生存與安全去勞動……而自賞則驅使人尋找任何機會，通過各種姿態、外表和聲音來展示自我優於他人……一個人在滿足自賞後，其內心的快樂與充實乃是能促進自身健康的強心劑。⁶⁸

曼德維爾認為人們心中的自賞會傷害人的合群性(sociableness)，並且會讓未經教化的人們自相殘殺，文雅之出現正好可以緩和及解決自賞所造成的危險。曼德維爾指出，文雅是一個奇妙的機制，既能讓社會中的個體得到滿足與舒適，同時又可維持社會整體的福祉與安全，⁶⁹可說是減少人類相互征伐的解方。曼德維爾在《寓言》第一冊書末寫道：滿足對自賞的渴望(這種滿足往往被道德家稱為惡習[vice])，這種行為才是「讓人類成為親社會動物的關鍵原因，也才是世界上各種工商業持續發展的基礎與泉源。」⁷⁰上述這句話的重點是，曼德維爾將滿足慾望、合群性以及國內工商之發展結合為一體，三者彼此牽動，環環相扣。

曼德維爾與笛福一樣，都注意到文雅與商業的關聯。⁷¹曼德維爾指出，在商業世界當中，「對利益和金錢的念頭」主宰了人們的行為。無論是在井然有序的舞會上，又或是在肅穆的喪禮上，都可以見到同

⁶⁸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40.

⁶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75.

⁷⁰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69.

⁷¹ 笛福對文雅與商人之聯繫的討論，請參見陳建元，〈交談、商業與文雅——丹尼爾·笛福與十八世紀初英格蘭的文雅文化〉，《新史學》，31：3，臺北，頁 1-70

樣的現象，也就是要克制自己真實念頭，而裝扮出文雅模樣。無論是舞會的主辦人又或是殯儀館的老闆都對於他們的收入感到「愉悅」，但是他們深刻明白，要想成功地經營事業，就需妥適地戴上面具，表現出被期望的模樣。曼德維爾稱：「他們都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厭倦，一個人的快樂是被迫的，另一個人的嚴肅也是裝出來的。」⁷²曼德維爾並且強調這兩個行業並非特例，所有其他商業活動也遵循著同樣的原則，以裝模作樣的方式進行，這在商業社會中商人與客戶間的交易中隨處可見。例如在《蜜蜂的寓言》中曼德維爾所設計的年輕女士與綢緞商人的一段對話中，便可以看到買賣雙方各自為了利益考量，如何盡其所能地斯文有禮來試圖達成目標。曼德維爾也預期到自己如此尖銳地直陳人的心理，許多人必然會加以反對，包括那些真心擁抱文雅的人們。但曼德維爾自豪地說道，「只有少數人能夠有空去檢視自己，能夠以正確的方式去檢視自己的人則更少。種種強烈情感之於人類，猶如種種顏色之於布料。」⁷³

整體而言，曼德維爾支持文雅文化的核心理由是，文雅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具有實用價值，人們體悟到隱藏自身的自愛心將帶來好處，對於其他人的容忍程度也就隨之提高。⁷⁴相反地，兩個尚未開化的人不會懂得隱藏自己的種種情感，往來時不僅充滿暴戾之氣，發生衝突更是司空見慣之事。用曼德維爾的話來說，「不文明的人群之間」，互動往來往往淪為一種情感宣洩，而讓「人與人之間無法容忍彼此。」⁷⁵於是產生衝突，造成國力內耗。高度文明化的社會中，人們可以透過追求文雅、奢侈品而彼此和平相處，人口也將因此增加，文明社會

⁷²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49.

⁷³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84.

⁷⁴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45.

⁷⁵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38.

的生活品質也因而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曼德維爾主張，當一個人知識不斷精進，其行為禮節亦會逐漸優雅(polished)，而當文雅程度提升，人們的慾望也會跟著擴大，更講究品味，其惡習也就隨之增多。⁷⁶一個國家或社會的進步表現在國民知識層面的進展，及其行為舉止日益文雅。這種文雅程度的提升，必然預示著貪婪與奢侈品將隨之出現，然亦有好處：「唯有發展航海業，鼓勵商人經商，促進各種商業貿易。這將會帶來財富，而一旦有財富，種種工藝和科學便會迅速發展。」⁷⁷易言之，文雅文化導致人們注重行為舉止，也令人們擴大了對許多事物的慾望。批評者會說這是慾望橫流、罪惡蔓生，但是支持者看來，這讓國家更加強盛。此外，文明發展達到一定高度後，「會讓這個社會中的窮人，在生活水準上都要比過往時代的富人階層都要進步。」⁷⁸這一點對於一國軍事也相當重要，因為在十八世紀的戰爭中，鄉紳貴族負責在後方帷幄運籌，而負責在前線出生入死的正是窮人。戰爭的艱辛與痛楚都是該國最窮困的那群人所要去承擔的。⁷⁹曼德維爾的重點在於，食衣住行各方面較其他國家更富足之國，其窮人的戰鬥能力和資源也會勝過其他國家，因此更容易在戰場上得勝。

四、文雅與國際競爭力

曼德維爾認為文雅對人類社會具備多重重要性。就消極面而言，

⁷⁶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46.

⁷⁷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184-185.

⁷⁸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26.

⁷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119.

承上文，人類在社會中與其他人相處時，若是完全不克制自我的話，該社會必然衝突不斷而永無寧日，也必然無安定富足可言。文雅便是解決這問題的處方。人們在文雅文化中會為了滿足自我虛榮心而去學習如何扮演出熱愛社會、喜好與人往來的模樣；人們也因此得以和平共處，該國家亦不會因為內鬥而虛耗國力。⁸⁰人類之所以能裝扮出喜好社會的模樣，曼德維爾直陳這只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人類「變化無窮的慾望」，其二則是「人在竭力滿足慾望的過程中不斷遇到障礙」。⁸¹從積極層面而言，文雅對於生活各層面的講究(這在十八世紀初許多道德作家的眼中便是奢侈品)促進了一國工商業的發展，進而能讓此國家養活更多的人口以及負擔得起先進的軍事裝備，國家因此變得既富且強。

歷來研究曼德維爾經濟思想的學者多稱他為重商主義者(mercantilist)。⁸²關於重商主義的精確定義有諸多辯論與爭議，普遍接受的定義大略是：一國政府以關稅政策來限制進口外國手工業產品，同時抑制本國出口未加工的原物料，並以津貼補助本國加工製品的出口。他們以貿易餘額(balance of trade)來觀察與解釋國際貿易：一國家透過進出口方式，將可讓貴金屬(金、銀)留在本國，留在國內的貴金屬，便是該國在貿易餘額上的盈餘。從曼德維爾的論說中可以頻繁地觀察到上述的特點，以下茲舉一例：「每一個政府都應該對國家利益瞭如指掌，並且堅定不移地追求它。優秀的政治家通過靈活管理來對某些商品加以苛重關稅，

⁸⁰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286. 另外，曼德維爾認為，與其期待與假設人類天生具備善性，後天教育要來得更實在且重要，見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79, 305-306.

⁸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44.

⁸² 將曼德維爾視為重商主義作家的研究眾多，請見當中的代表性著作：Nathan Rosenberg, "Mandeville and Laissez-Faire"; Thomas Horne, *The Social Thought of Bernard Mandeville*, 51-75.

或是完全加以禁止，並且降低其他商品的關稅，便總能使貿易轉向他們想要的方向……但最重要的是，他們會密切關注貿易的總體餘額，絕不會讓一年之內進口的所有外國商品的價值超過他們自己種植的作物或製造出口到其他國家的出售價值。」⁸³

本文以下並未要推翻以重商主義來指稱曼德維爾經濟思想的論述，而是要更為細緻地討論曼德維爾認為文雅和奢侈品如何相互影響，文雅對於奢侈或說廣義的商業的影響，能夠如何幫助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勝出。其實這也正是重商主義的核心關懷。

綜觀自 1705 年短詩版本的《寓言》到 1729 年改為長篇論述的《寓言》第二部分，乃至 1732 年的《榮譽的起源》(*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Honour*)，都可以清楚看見曼德維爾的終極關懷是一個國家的堅強軍事實力、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他對於縱慾、揮霍等惡習的支持應該放在此思想脈絡中來理解。上一部分所討論的文雅，在曼德維爾看來，是經過複雜偽裝來滿足自我欲望的表現，歸根究底都是源於人性深處的自愛。曼德維爾認為自愛這種強烈情感存在於所有人心中，且人類滿足自愛的過程中，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促進公共利益。易言之，人對於自愛的追求可以「殊途同歸地」達到公民人文主義所追求的目標；也可以讓天性只愛自己的人類，即便是出於偽裝，也成為社會中的一員，而且在他人看來極具合群性。

因此，曼德維爾也從公共福祉、國家利益之角度批評沙夫茨伯里的文雅觀。曼德維爾反對沙夫茨伯里所謂公共福祉必定與德性密不可分，更反對他所謂人類可以在「不麻煩或強力扭曲自己本性的情況下」實踐德性。⁸⁴在他看來，沙夫茨伯里與其他道德作家，錯誤地將在動

⁸³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116.

⁸³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23.

⁸⁴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23.

物天性中的原始強烈情感轉化為善意(benevolent)情感，⁸⁵而且還將這些不存在的善意情感稱之為德性，並視為人類社會的根基。曼德維爾認為這種盲目樂觀的幻想，對於國家、社會的整體福祉反而有害。反之，這些惡習(例如沉迷於奢侈品)一旦在政府管理下被有智慧地運用，反而將會是「一個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稱雄(worldly Greatness)之道。」曼德維爾說：

任何擔負著治理相當國民之職責的掌權者，無論是君主國，是共和政體，還是兩者的混合政體，只要善加利用這些手腕，都必定能使國家繁榮昌盛，無論奢侈品或其他惡習都不能動搖其國體。⁸⁶

曼德維爾進一步指出：若是有人拒絕奢侈品、拒絕享受現世的眾多便利商品，那麼想要在世間競爭中「贏得榮譽……只不過是存在於腦中的空想而已。」⁸⁷文雅、奢侈品和文明之先進與否之間高度相關，易言之，一個社會中的普遍知識水平若是蒸蒸日上，而且成員之間彼此寬容，那麼大抵上便可確定這個社會的文雅程度必然不低。勤奮、知識與寬容是一致的發展，而且是人類社會踏入文雅時代(奢侈品時代)後才出現的獨特現象。人與人之間彼此寬容能讓一國家內部的成員和諧共處，他們因此能夠團結一致對外；曼德維爾因此認為在十八世紀的國際競爭中，在國際間得勝的國家往往是愈文雅、奢侈品愈發達的國家。

⁸⁵ 關於沙夫茨伯里對於人性中善意情感的討論，見 Isabel Rivers, *Reason, Grace, and Sentiment: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Religion and Ethics in England, 1660-1780*, Vol. 2, *Shaftesbury to Hu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5-152.

⁸⁶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117. 曼德維爾在另一處也指出：「純粹的德性無法讓國家繁盛，而各國若還是希望復興這種黃金時代，那麼在堅持正直誠實的同時，就得接受要靠苦澀的橡果來填飽肚子。」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7.

⁸⁷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6.

至於史蒂爾與阿迪生的《閒談者》與《旁觀者》，其中許多文章歌頌了商業有助於國家財富之累積，因此學者一般將他們視為擁抱新興商業社會的作家。不過，若進一步檢視他們的具體論述會注意到，例如史蒂爾在討論商業時，著重的部分泰半在於個別商人的操守。他認為商人的勤儉與德性將影響全國商業的整體運作，於是像是鼓勵人們大量消費奢侈品，便不會是史蒂爾與《旁觀者》的作者群所能接受的。要言之，史蒂爾等人對商業的關心，主要集中在適度的商業活動如何鼓勵人與人的接觸，並且讓人在頻繁接觸中學習容忍他人與調適自我。他們認為個別商人的道德修養，會直接影響整體商業的發展。因此，若是商人自身沉溺於追求無限獲利或是高度消費，便會被史蒂爾等人視為潛在的危險。例如在《旁觀者》第五十五期中，阿迪生將奢侈品與貪婪並列陳述，並且認為兩者在道德上皆為負面價值。與此同時，《旁觀者》也會稱頌德性乃是從貧窮中孕育而生。再者，即使注意到奢侈品有促進貿易之效果，《旁觀者》仍然將之視為一種反映出人類自愛心受到挑戰的現象。

曼德維爾於 1709-10 年間是《女性閒談者》雜誌的主編者，這是一份直接針對史蒂爾《閒談者》而發的雜誌，曼德維爾在其中藉由在茶會、咖啡廳中閒談的女性虛構對話，來回應史蒂爾的主張。在《女性閒談者》第六十二期中，名為露辛達(Lucinda)的婦女引述艾薩克·比克斯塔夫(Isaac Bickerstaff, 也就是史蒂爾在《閒談者》中的化身)先生的說法：人若要真正地活著，就必須拋開所有的個人利益和享樂，要十分慷慨地為他人的利益辛勤勞動。英格蘭今日之所以是文雅、文明國家，都必須感謝那些為了公眾利益而發明諸項事物的人。⁸⁸露辛達說完後，代表曼德維爾意見的牛津紳士(The Oxford Gentleman)則逐條加以反駁。他首

⁸⁸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emale Tatler*, 98.

先指出，人類社會最偉大和最直接的恩人，其實是那些盲目消費的有錢人，他們的支出讓整個社會更加富裕。其次，人類確實是社會性生物，但並非《閒談者》所謂出於重視、喜歡自己的同類；相反地，社會性是出於所有人類對自己的強烈自愛，而在政治家巧妙的管理下，人可以在滿足自我慾望的同時又與他人共同組成社會。第三，一個國家的繁榮與否，謙虛、節制、安分守己、節儉等德性所能發揮的效果微不足道，真正有影響力的是揮霍、貪婪等惡習。他指出：

有錢人消費得越多，他就是一個愈好的臣民，唯有仰賴那些擁有財富並願意將其花光的人，我們才能享受到為了增進生活中各種舒適和光彩而被發明的藝術和科學。⁸⁹

曼德維爾表明，有學識和公共精神的人對社會的重要性沒有史蒂爾等人所設想的那麼大。上述「牛津紳士」的《女性閒談者》在第八十期指出社會上榮譽和尊貴的人們，他們那些受到讚揚的行為並非出於純粹的利他，而是為了讓別人得到讚揚。因此，「如果有公德心的人……嚴格省視自己，他會發現自己格外用心完成的事情，全都是基於對自己的考量所出發的。」⁹⁰

曼德維爾指出史蒂爾等人在期刊中一方面譴責奢侈品，另一方面又讚揚利他德性。曼德維爾認為這兩者無法並行，因此是說不通的；因為奢侈品能夠讓國家經濟更為強大，光是考量到這一點就不應該排斥它。曼德維爾指出，史蒂爾爵士的雄辯修辭雖然乍看之下頗具說服力，然而在經過仔細考察後，會發現其原來是狡黠的詭辯(ingenious Sophistry)。⁹¹隨著一個社會的進步，其文雅斯文必然會隨之提升。但是，這個現象的出現並不如沙夫茨伯里、史蒂爾等人所言，是出於人類的

⁸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emale Tatler*, 100.

⁹⁰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emale Tatler*, 152.

⁹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53.

合群(sociability)天性；文雅的重要性自然也不在於其對於人類合群性的強化。曼德維爾舉例，就像讓幼童自小便養成文雅修養的最好途徑，並不是利他德性，而是大人對孩子們的「吹捧 / 灌迷湯」(gross Encomiums)(參本文第二節所舉的年幼女孩的例子)。⁹²

曼德維爾認為，若是我們回顧古希臘、古羅馬的歷史便會看到，文明社會的成員，無論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人或是當代人，最渴望的目標乃是舒適、快樂(Comfort and Delight)，曼德維爾總結這便是文雅所帶來的益處。曼德維爾接著提出兩個重點，第一點是：「奢侈品與文雅總是一同茁壯，彼此從不曾分開發展。」⁹³若說文雅文化的興起是一個先進社會的表現，與文雅緊密相關的奢侈品因此也是先進社會的一項特徵。第二個重點則是，奢侈品激發了人們的貪慾，進而鼓勵該國商品的生產與流通，連帶這個國家變得富有；同理，文雅也可以讓國家變得更加富有，這也是應該支持文雅文化的強力理由。

曼德維爾力陳，在人類社會中沒有任何一種事物會是徹頭徹尾的邪惡(entirely Evil)，而且從人類歷史長河中可以找到無數例證表明，所謂的惡習(例如喜好奢侈或是自私自利)往往對於這個世界上的某些人有所助益。他不同意將揮霍直接斥為洪水猛獸，相反地，他認為人類的消費慾望唯有跟「其他事物放在一塊參照……才能判斷出其善惡好壞。」

⁹⁴ 曼德維爾將人類慾望這種無止境地發展與國家強盛連結起來：

⁹²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53.

⁹³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47.

⁹⁴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67. 關於曼德維爾論各種事物的兩極效果，以及非預期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請見 Rudi Verburg, "Bernard Mandeville's Vision of the Social Utility of Pride and Greed,"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2: 4 (July, 2015): 672-674.

貿易和製造業的種類愈多，就業者將愈是勤勉；這些產業愈細分成各種產業，一個社會就愈可以雇用更多人口，而且人與人之間不需要互搶飯碗；該社會也就愈容易變得富裕、強盛和繁榮。⁹⁵

學者過去針對這段引文多注重曼德維爾的勞動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 思想，像是學者湯瑪斯·洪 (Thomas Home) 便認為這是曼德維爾調和人類無窮慾望與社會凝聚力的解方；⁹⁶ 另名學者尼爾·德·瑪奇 (Neil de Marchi) 則著重曼德維爾認為人類社會乃是建立在分工以及慾望滿足之上。⁹⁷ 本文同意這些論點，不過目前學界關於上述引文最後一句的「富裕、強盛」與文雅之間的關係，仍未有深入的處理，而這便是以下要探討的主題。

曼德維爾認為英格蘭在十七世紀中葉以降乃至《寓言》出版的一七一〇年代間，透過商業、國際貿易獲取大量財富，國力因此與日增強，而且也發展出日益精緻的文雅文化。然而，英格蘭的政治局勢並未因富有而走向腐化，反而遠比古羅馬要來得穩定；可見國家所享有的財富讓英格蘭政府更具抵抗外力侵擾的自衛能力。⁹⁸ 從曼德維爾的這個論點可以看出，他深刻體悟到十八世紀的世界與過往時代的關鍵

⁹⁵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67.

⁹⁶ Thomas A. Horne, "Bernard Mandeville's Ironic History of Politeness," in *Politics, Politeness and Patriotism*, eds. Gordon J. Schochet, Patricia E. Tatspaugh, and Carol Brobeck (Washington: Folger Institute, 1993), 238.

⁹⁷ Neil de Marchi, "Exposure to Strangers and Superfluities; Mandeville's Regimen for Great Wealth and Foreign Treasure," in *Physicia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Six Studies of the Work of Doctor-Economists*, ed. Peter D. Groenewegen (London: Routledge, 2001), 86.

⁹⁸ Edward Hundert, "Mandeville, Rousseau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antasy," 33.

差異。曼德維爾用政府管理的完善與不完善(male-administration)與否，來取代過去以德性作為判斷政體優劣的準則。換句話說，公民人文主義者往往宣稱古羅馬沉迷於東方奢侈品，德性因此萎縮，故走向衰亡，以此批判奢侈品；但是根據曼德維爾對政府管理的見解，導致羅馬走向衰敗的主因乃是不厲行法治的政府與無止盡的征服慾望，與奢侈品並沒有直接關係。⁹⁹一個政府若要保持強盛，需要留心的不是人民購買讓自己生活更舒適的產品，而是應該去糾正錯誤政策、對政務之疏忽和管理不善。他舉其出生地的例子證明，低地國荷蘭的繁榮不是因為荷蘭人德性高尚，而是因其政府極富「政治智慧」(political wisdom)並實施良好的治理。¹⁰⁰

曼德維爾評判一個現代政府的治理是否良善時，著眼的重點之一是其公共政策是否促進了轄下人民的物質福祉。就這方面而言，奢侈品無疑是一個國家應該重點鼓勵的產業。比起強制人民恪守勤儉的舊思路，曼德維爾認為讓人民享受更多奢侈品並不是懶惰(sloth)，反而促使人民更具生產力，從而提升人民的物質生活。一個國家的先進、偉大與軍事力量是同義詞，曼德維爾因此主張一個以國際貿易為核心產業的國家(trading nation)，其軍事力量往往會是強大的，它並不會因為仰

⁹⁹ 曼德維爾之所以批評共和主義者所推崇的西賽羅，也可從這個角度思考。例如曼德維爾在《寓言》的第二部分寫道：「西塞羅所說的對他人或對自己的善意或義務並不存在。」見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2:47. 此外，共和主義者常推崇的老加圖(Cato the Elder, 234-149 BC)，在曼德維爾筆下則是個內心充滿自愛的人，他的自殺並不值得推崇，反而可以看出他對於凱撒無法平息的仇恨與嫉妒。見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35.

¹⁰⁰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185. 參見 T. W.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Oxford: Basil Blackford, 1988), 119-121.

賴商業而變得羸弱。反之，曼德維爾主張那些非商業社會的人民泰半懶惰，往往缺乏知識、技能與勤奮心，其軍隊與戰略過時且拙劣。在這種條件下，他們只擅長突發的遭遇戰，而無法在大規模的進攻或防禦戰事中取勝。一個文明大國，因為其文明的整體性進步，必然是一個軍事強國。這背後一個根本原因在於，這個國家的工商業隨著文明精進而發展，越發達的產業代表需要越多僱傭人力，¹⁰¹而這群不斷增加的人口，將能滿足在軍事動員時所需要的大量人力。

充足的勞動力對於曼德維爾而言，除了能夠作為經濟活動上的重要資源外，也是一個國家在國際對抗中勝敗的關鍵。勞動力與本文主旨最為相關之處在於：曼德維爾主張正是基於奢侈品和文雅所孕育出來的各種產業，讓十八世紀初的英格蘭有許多人獲得就業機會。正如他指出的：「為大多數窮人提供工作，乃是每一個政府、立法機關最看重的事情。」¹⁰²不過，就算是在指出國際貿易對於勞動力之正面助益時，曼德維爾依然會剖析事物表象下的複雜性。他指出，因為國際貿易而蓬勃發展的航海業固然極為重要，但是該產業並不像該時代其他商業作家所說的有百益而無一害。羅伯特·霍普金斯指出，曼德維爾批評的對象是阿迪生在《旁觀者》第 69 期中關於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的著名描述。阿迪生在此期當中對於皇家交易所中世界各地的

¹⁰¹ 例如，在商業社會中，一塊最稀鬆平常的約克郡布，曼德維爾指出，需要「眾多的人手、行業、技術以及各式各樣的工具」並且「付出艱辛、勞作，以及耗費漫長時光」方能造出，見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169-170. 另外，曼德維爾也曾舉例：普通士兵穿上一件猩紅色服裝(crimson cloth)會令他感到驕傲且滿足，而這件服裝的製作過程需要某些人冒著生命危險到海外取得顏料方能完成，不過這也代表了光是這麼一件布料，就支撐著該國家中各種不同行業的運作，見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58.

¹⁰²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58.

商人帶來英格蘭的各色商品讚不絕口。¹⁰³然而，對於曼德維爾而言，《旁觀者》的作者們並未深入思考商業的本質及其影響究竟為何。後者雖然歌頌商業，卻同時批評商業所帶來的奢侈品之負面影響。曼德維爾認為，人的慾望無窮，不可能要求顧客在消費時仍緊守節制之道，這也是《旁觀者》式文雅的問題所在。¹⁰⁴曼德維爾驚嘆於在這個國家中：

居然會有一群人談論船隻和航海業時，會將它說成是上天對自己的特殊恩典(peculiar blessing)，還會因為擁有散布於世界各地的無數船隻、總有開往世界各角落的船隻，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船隻抵達本國而歡欣鼓舞。¹⁰⁵

曼德維爾當然不是要反對商業帶來的好處，他要提醒讀者，自己並不會迴避商業世界中的殘酷現實，因為他不同於其他謳歌或過分美化商業貿易的作家。曼德維爾寫道：

在一個以國際貿易為核心產業的國家當中，海上每颳起一場狂風，全國的老闆和保險業主們都會輾轉難眠、心痛欲裂，這難道不是我們應當格外銘記於心的一件事情嗎？¹⁰⁶

¹⁰³ Robert H. Hopkins, "The Cant of Social Compromise: Some Observations on Mandeville's Satire," in *Mandeville Studies: New Explorations in the Art and Thought of Dr. 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 ed. Irwin Primer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75), 178.

¹⁰⁴ Charles A Knight, "The *Spectator's* Moral Economy," *Modern Philology* 91:2 (November, 1993): 172; Laura J. Rosenthal, "Sex, Money, and Feelings: Mandeville's Dialogue with Sentimental Drama," in *Bernard de Mandeville's Tropology of Paradoxes: Moral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rapy*, ed. Edmundo Balsemão Pires and Joaquim Braga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52-53.

¹⁰⁵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61.

¹⁰⁶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60.

航海業繁盛發展之下，「葬身大海、觸礁、被流沙吞沒的航船不計其數」，「因為船員的疏忽大意和狂飲烈酒」而燒毀的船隻也不在少數；或者是準備不足而染上熱病，因而整隻船隊覆滅的也不在少數。

曼德維爾在著作中提到，海難層出不窮，且長期出海對於船員身心有負面影響，這種種筆法所要傳遞的訊息，跟他針對文雅、德性的論述其實互為參照。曼德維爾所要強調的是：世間萬物帶來的正反面效果都必須放在多層次的複雜脈絡中方能看清。若海上永遠沒有船難，那麼船匠便不會有建造新船的機會；若錨和錨鏈很少損壞，那麼「打造錨鏈的鐵匠鋪和纜繩作坊要過著喝西北風」的日子，進口鐵器、帆布、大麻、瀝青的商人都將從商界銷聲匿跡。¹⁰⁷曼德維爾引用了一句諺語總結：「倘若天上總是下雨，永遠不出太陽，地上的水果很快便會爛掉；儘管如此，若要收穫青草或穀物，雨水像陽光一樣不可或缺。」就此意義而言，奢侈品就類似於暴風雨。若是「航船總是不會遇上風暴，那麼船上需要雇用的人手便會更少。」¹⁰⁸同理，若是世上沒有奢侈品的話，曼德維爾認為國家可以養育的人口也就會變少。

暴風雨譬喻結束後，曼德維爾將話鋒轉移到國際戰爭，藉此強調人口數量、奢侈品產業對於軍事的重要性。曼德維爾警告，若是英格蘭奢侈品產業不振，那麼各種跟海洋有關的產業必然隨之萎縮，戰爭一旦爆發，陣容龐大的皇家海軍很可能會欠缺船隻或具備航海知識的人才，他警告讀者，這最終會造成的後果是：海軍能夠投入戰事的軍艦數目勢必會因此減少。曼德維爾在這裡要傳遞的訊息是，若是國家主政者相信節儉德性更勝享受消費，並且因此抗拒奢侈品，這個國家最終的下場必然是被其他擁抱奢侈品的國家所打敗。一國領導者「善

¹⁰⁷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63.

¹⁰⁸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64.

良、正直以及愛好和平的個性」並無法幫助他抵禦其他想要打造豐功偉業、征服四方的政治領袖。¹⁰⁹曼德維爾認為一個理想的國家，應該擁抱奢侈品，把國家在世俗權力上的強大視為最高幸福，並且將國家的軍事榮譽與戰力視為一個國家衡量自我的絕對標準。

正是在這裡，曼德維爾的文雅觀與其追求國家強盛的政治經濟學有了最明確的交會。曼德維爾指出，要讓國家強盛，就必須仰仗文雅文化，因為講究禮儀與穿著將帶動許多產業，並使社會足以僱傭眾多人手。在文雅文化中：

體面的外表(appear decently)是種文明(civility)的表現，而且通常是一種責任，是我們必須對自己的交談對象負起的責任。

「體面」(decency)這個詞本身便包含了衣著、車馬等等各方面。這些排場從物質層面來看，確實是奢侈品。然而曼德維爾要說的是，除了這層物質層面的意義外，這些對於文雅上的追求，其實是一個文明國家、一個國力強盛國家的必然表現。¹¹⁰誠如曼德維爾在 1729 年出版的《寓言》第二部中所寫的：

一般人所希望和祈求的國家幸福乃是財富、國力、榮耀和舉世聞名的強盛，乃是國內生活舒適、物產豐榮、工商興旺，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對於自己國家的畏懼、恭敬和尊重。¹¹¹

在曼德維爾心中，國民的舒適生活與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同等重要。而這樣的舒適生活，曼德維爾認為是要由一個強大積極的政府才能達成。

¹⁰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65.

¹¹⁰ 學者佩托能(Markku Peltonen)同樣指出，曼德維爾在其作品中將「文雅和奢侈品，良好舉止和財富都互相糾纏在一起。奢侈品、禮貌和商業是同一歷史發展的一部分。」見 Markku Peltonen, *The Due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300.

¹¹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06.

這個政府必須制定法律，規範影響國家利益的貿易，鼓勵農漁業，執行大量公共工程(疏濬河流、排乾沼澤)，並且讓勞動的窮人服從管理且勤奮。¹¹²此外，文雅文化日益精緻的同時，相關產業必然需要僱傭更多人手，也就是這個文明國家的軍事力亦將強化的背景因素。此外，人口數量是國力的關鍵，為此應該要設立各種製造業，開發所有可能的土地，讓多餘的勞動力加入軍隊，將他們訓練得「大膽好戰」(bold and warlike)並且遵守軍紀。¹¹³

總而言之，若是一個國家不接受奢侈消費文化，而要求人民安於貧苦，克制心中的貪婪慾望，這樣的國家不可能在文雅和「工藝與科學」(arts and sciences)上日益精進。更重要的是，其鄰國勢必藉著他們不思長進的機會而來為難、干預他們。¹¹⁴曼德維爾指出，若一國要免於他國之欺凌，要在這樣的商業時代中自保，必定要去刺激人民對於各種事物的佔有慾：

教導他們[人民]貿易與手工，你便能在他們當中喚起妒忌與競爭；增加他們的財產，讓各種工廠被建立起來，不荒廢一寸土地……這種國家每每總是眾人群集、從不缺乏人口。

這種慾望同樣是國家軍事力量之根基：

若要使國民勇敢好戰，服從軍紀，就必須充分利用人們的畏懼，並要千方百計地迎合人們的虛榮心。¹¹⁵

要言之，在商業時代，國防仰賴於國家的財富多寡。政治層面上，高官的放縱行為以及百姓的模仿風氣絲毫不會削弱公民的勇氣和剛毅，也絲毫不會威脅到公共安全。商業國家的軍事勝敗不再需要仰賴古代

¹¹²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17-318.

¹¹³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184.

¹¹⁴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183.

¹¹⁵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184.

的共和德性。從 1713 年英格蘭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戰勝法國可見，像英格蘭這樣的現代國家，軍事力量仰賴的是先進的武器以及足以支付軍餉的充足國庫，而不再是公民的軍事德性。曼德維爾宣稱，那些公民德性就是過分「浪漫的想法」，現在只會讓「那些對世道有深入理解的人啼笑皆非而已。」¹¹⁶

誠如前文所述，曼德維爾認為人口增多，對於國際貿易的競爭以及國家的生存極為關鍵。不過，在他的經濟思想中，若是要產出在國際貿易上最為低價且具競爭力的商品，必須讓某一窮人僅接受最低程度的教育，讓他們對於生活沒有什麼慾望，他們便會滿意地生活在艱困的工作重擔之中。因此，「他們中有許多人既貧窮又無知是必要的。」¹¹⁷以上這樣的說法，在曼德維爾的批評者看來，顯然與他在《寓言》第一部分中所說，人人慾望無窮，人人都想要過享樂生活的主張自相矛盾。

曼德維爾寫作時便已經預料到他對窮人的論點會備受攻擊，故行文時便已明白指出，假設這世界如某些理想主義者所說，是那樣美好的國度，那麼那些對於窮人教育與福利的妥善安排都是可行的，然而現實情勢並非如此。再者，在國際貿易競爭、軍事對抗的急迫環境下，曼德維爾思考的是該如何維持國家的生存與利益，對他而言，慈善學校這些作為是太過冠冕堂皇的主張。他指出：

當我指出任何社會若沒有惡習無法變得富強，無法獲得現世的最高榮耀，我的意思並不是要人去恣意為非作歹。就好像我說，若是一個社會沒有足夠的極度自私者以及訟棍，就不可能有大

¹¹⁶ Bernard Mandeville, *Free Thoughts on Religion, the Church & National Happiness* (1720), ed. Irwin Primer (Piscataway,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285.

¹¹⁷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288.

量的律師享受著光鮮亮麗的生活，但是我並不是要鼓吹人們動輒爭吵或是極度貪婪。¹¹⁸

曼德維爾《寓言》的其中一個論述是，「自私」乃是國家繁榮、個人道德與人類組成社會的根基。但是他在論證中並不反對沙夫茨伯里或其他道德作家所嚮往的那種公民文明、勤奮與樂於交際的社會，只是雙方對於這種社會背後形成動力的解釋截然不同。在沙夫茨伯里式的觀點中，根本動力是人的德性；但在曼德維爾的解釋中，文雅背後的驅動力是強烈的不合群情感(unsocial passions)。曼德維爾知道沙夫茨伯里所謂的利他兼善的德性為何，但是他指出這種德性觀不切實際，若是全國上下奉行這種價值觀，這樣的國家不可能有先進的物質條件，遑論沙夫茨伯里所稱讚的文雅生活。曼德維爾認為對於文雅文明的追求，無論是在衣裝、器物或者是藝術消費等等，都有助於英格蘭朝一個「偉大的貿易國家」邁進。然而，經濟的繁榮不是靠善良人性來促成的，而是從人性缺陷之處推進，即「驕傲與奢侈品方為貿易的最大動力來源。」¹¹⁹曼德維爾指出，吾人應該要承認那種光明樂觀的德性觀與現實世界的巨大落差，而坦誠地去接受「最美麗的上層建築可能是建立在腐朽卑劣的基座之上」¹²⁰，因為「沒有一個社會能在沒有人類罪惡的情況下，一直富裕和強大下去。」¹²¹

在曼德維爾的國際貿易思想藍圖中，文雅便是幫助他們在國際貿易上勝出之重點。曼德維爾認為，為政者和一國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不是去照顧過去公民道德主義者所關心的，諸如奢侈品將帶來萎靡、腐化的道德問題；而只需時刻警惕國家「貿易餘額的盈餘」，即現代所

¹¹⁸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231.

¹¹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124.

¹²⁰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64.

¹²¹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229.

謂的貿易出超狀態，民眾可以放心地盡量消費外國商品，同時精進本國的文雅文化。財富與文雅乃是一體兩面。一個國家若企圖獲得巨大財富，就必須接受必然伴隨而來的「貪婪和奢侈」；易言之，一個貿易發達的地方，必然會產生為數眾多的詐欺。¹²²但曼德維爾認為，只要貿易政策確保整個國家的進口總額不超過出口總額，國民的自私和貪婪可以放心地任其自由發展。

本節強調國家的榮耀與強盛在曼德維爾政經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他如何為了這個目標，不惜犧牲某些過於理想的政策。窮人生計的問題與英格蘭在國際貿易的競爭以及文雅文化的發展，對於曼德維爾而言乃是同一個大問題下的不同稜面。一個偉大又富有的國家，其中必然存在著文雅，也一定需要有被某些人視為「瘟疫和怪物」的奢侈品產業，如此方能創造各式各樣的勞動，也才能讓國家廣大的窮苦勞動者得以謀生求得溫飽。¹²³曼德維爾在《寓言》當中澄清，一個社會固然沒有人的罪惡就不會繁榮，但是他不認為適用於社會的東西也適用於個人，亦即他並非鼓吹個人去犯下惡行。他說道：

我不曾主張也未曾想像過，在富強王國裡的人不會有像赤貧 (most pitiful) 國家一樣具備賢德的人。但是我坦承自己的確相信，沒有一個社會能在沒有人類罪惡的情況下……提升為一個富裕、強盛的王國。¹²⁴

他明白某些作家所想像的理想社會，但是基於現實的考量，以及對於一個國家最多數人群的最大幸福，他認為惡行、不體面的行為、深具爭議性的行業都必須要繼續下去。

¹²²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185.

¹²³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355-356.

¹²⁴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 229.

五、結語

文雅文化在十七世紀末以降的英格蘭、蘇格蘭的重要性，近二十餘年來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學者業已指出曼德維爾並不反對文雅文化，他反對的是沙夫茨伯里、阿迪生將文雅歸諸於性善論以及人類天生具合群性的主張。雖然曼德維爾嘲弄沙夫茨伯里等人對文雅文化的過分美化，但是從經濟的角度出發，文雅文化確實能夠帶動消費以及經濟發展，並且促進國家的和平，而這皆有助於國家強盛——而這正是曼德維爾的核心關懷所在。

誠如過往研究已經指出的，在不同社會階層的生活與著作中，文雅文化有著不同面貌。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讀者主要是貴族與鄉紳階層，阿迪生的作品則是以鄉紳與文人，而笛福的讀者則是新興商人階層，亦即中間階層中較下層的一群人。以上是從讀者群的不同來分類文雅文化，而曼德維爾對於文雅文化的剖析則呈現出另一個分析文雅文化的方式，也就是從實際影響層次切入。具體而言，曼德維爾無法接受沙夫茨伯里伯爵「道德感是人的內心與生俱來的，而且在彼此的往來中可以獲得提升」的看法。再者，曼德維爾也不認同史蒂爾關於各種文雅社交禮儀乃是出於真心的觀點。曼德維爾之所以支持文雅文化，不是因為這些道德情感，而是基於文雅文化所帶來的實際效益。

曼德維爾一方面用文雅、禮節的語言來捍衛商業社會，另一方面以商業帶來的實際成果來定義文雅。他在〈文雅的起源〉中解釋了為何我們會有文雅，因為「所有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在交談中都是令人討厭的。」¹²⁵文雅的核心精神就是要讓自己被他人接受，而在此過程中，

¹²⁵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II, 138.

人群彼此之間的爭執會減少，因為人們會將驕傲隱藏在文雅與良好舉止中，而文雅在衣物車馬的講究(亦即奢侈品)下，亦將進一步帶動商業之發展。

整體而言，本文將曼德維爾關於奢侈品的思考與文雅文化合而觀之，並且修正了過往研究認為曼德維爾反對文雅文化的論點，以曼德維爾的核心關懷「國家強盛」切入，從政治經濟學的面向重新考察他對文雅文化的正面評價，進而刻劃出在曼德維爾對於文雅文化的見解，分梳曼德維爾與沙夫茨伯里和阿迪生等人關於文雅看法的細緻異同。

(本文於 2022 年 5 月 15 日收稿；2023 年 5 月 4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伯納德·曼德維爾對十八世紀初文雅文化的詮釋與改造」(MOST 110-2410-H-003-145)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於 2021 年第五十四回臺灣世界史討論會宣讀，蒙評論人陳禹仲教授指正甚多，筆者衷心銘感。最後蒙兩位審查人詳閱與斧正，筆者深感受益，特在此一併致謝。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Anon, *The Muses Holiday: Or, the Polite Songster. Being an Elegant Collection of the Most Favourite New Songs, Etc.* London, 1757.
- Anon, *The Nightingale. A Choice Collection of New and Polite Songs.* London, 1770.
- Mandeville, Bernard. *A Letter to Dion, Occasion'd by His Book Call'd Alciphron, Or the Minute Philosopher.* London: J. Roberts, 1732.
- . *By a Society of Ladies: Essays in The Female Tatler*, edited by M. M. Goldsmith.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9.
- . *Free Thoughts on Religion, the Church & National Happiness (1720)*, edited by Irwin Primer. Piscataway,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 .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edited by F.B. Kaye. Vol. I. With a Commentary Critical, Historical, and Explanatory by F.B. Kay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8.
- .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edited by F.B. Kaye. Vol. II. With a Commentary Critical, Historical, and Explanatory by F.B. Kay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8.
-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edited by Lawrence E. Kle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Steele, Richard, and Joseph Addison. *The Tatler*, edited by Donald F. Bond. Vol. 2.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二、近人論著

- Barker-Benfield, G. J. *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 Sex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Berry, Christopher J. *The Idea of Luxury: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Branchi, Andrea. "Honour and the Art of Politics." *I castelli di Yale online*, 6:2 (2019): 29-43.
- Goldsmith, M. M. "Liberty, Luxur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edited by Anthony Pagden, 225-2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Bernard Mandevill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Herd, Jennifer A. *Putting on Virtue: The Legacy of the Splendid Vi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Hont, Istva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Debate on Commerce and Luxu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edited by Mark Goldie and Robert Wokler, 377-4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Hopkins, Robert H. "The Cant of Social Compromise: Some Observations on Mandeville's Satire." In *Mandeville Studies: New Explorations in the Art and Thought of Dr. 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 edited by Irwin Primer, 168-192.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75.
- Horne, Thomas A. "Bernard Mandeville's Ironic History of Politeness." In *Politics, Politeness and Patriotism*, edited by Gordon J. Schochet, Carol Brobeck, and Patricia E. Tatspaugh, 229-244. Washington: Folger Institute, 1993.
- . *The Social Thought of Bernard Mandeville: Virtue and Commerce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Hundert, Edward. "Mandeville, Rousseau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antasy." In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bates, Desires and Delectable Goods*, edited by Maxine Berg and Elizabeth Eger, 28-40.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3.
- Hutchison, T. W.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Oxford: Basil Blackford, 1988.
- Jack, Malcolm. *Corruption & Progress: The Eighteenth-Century Debate*. New York: AMS Press, 1989.
- Kaye, F.B. "Introduction." In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1732]*, edited by F.B. Kaye. Volume 1.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8.

- Klein, Lawrence E. "Liberty, Manners, and Politenes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2:3 (September, 1989): 583-605.
- .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night, Charles A. "The "Spectator"s" Moral Economy." *Modern Philology* 91:2 (November, 1993): 161-179.
- Knott, Martin Otero. "Mandeville on Governability." *Journal of Scottish Philosophy* 12:1 (June, 2014): 19-49.
- de Marchi, Neil. "Exposure to Strangers and Superfluities; Mandeville's Regimen for Great Wealth and Foreign Treasure." In *Physicia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Six Studies of the Work of Doctor-Economists*, edited by Peter D. Groenewegen, 67-92. London: Routledge, 2001.
- Peltonen, Markku. *The Due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ivility, Politeness and Hon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hillipson, Nicholas T. "Politics, Politeness and the Anglicisation of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Scottish Culture." In *Scotland and England: 1286-1815*, edited by Roger A. Mason, 226-246. Edinburgh: J. Donald, 1987.
- . "Propriety, Property and Prudence: David Hume and the Defence of the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edited by Nicholas T. Phillipson and Quentin Skinner, 302-3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ocock, J. G. A. "Cambridge Paradigms and Scotch Philosopher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ivic Humanist and the Civil Jurisprud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Social Thought." In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235-2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Pollock, Anthony. *Gender and the Fictions of the Public Sphere, 1690-1755*.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Rivers, Isabel. *Reason, Grace, and Sentiment: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Religion and Ethics in England, 1660-1780. Volume 2, Shaftesbury to Hu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Rosenberg, Nathan. "Mandeville and Laissez-Fai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4:2

(April/June, 1963): 183-196.

Rosenthal, Laura J. "Sex, Money, and Feelings: Mandeville's Dialogue with Sentimental Drama." In *Bernard de Mandeville's Topology of Paradoxes: Moral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rapy*, edited by Edmundo Balsemão Pires and Joaquim Braga, 49-63.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Sagar, Paul. *The Opinion of Mankind: Sociability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from Hobbes to Smi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Sweet, R. H. "Topographies of Politenes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2 (2002): 355-374.

Thomas, Keith. *In Pursuit of Civility: Manners and Civil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Verburg, Rudi. "Bernard Mandeville's Vision of the Social Utility of Pride and Greed."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2:4 (July, 2015): 662-691.

Wilkinson, Hazel. "The Complete Spectator: A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In *Joseph Addison: Tercentenary Essays*, edited by Paul Dav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Bernard Mandeville on Politeness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Its Impact on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en-yuen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Contrac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 a prominent writer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viewed the expanding impact of polite culture in English society during his lifetime. Much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how Mandeville, in a cynical tone, critiques and deconstructs the dominant views of polite culture advanced by 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While Mandeville dismisses Shaftesbury's discourse on politeness, which is grounded on an optimistic human nature, he does not entirely oppose the concept. Instead, Mandeville argues that politeness would stimulate consumption, which, in turn, could bolster England's economy. The adoption of a polite culture would help improve living standards, aid impoverished individuals in sustaining themselves, and fortify England's national power. Mandeville maintained that a nation's well-being and strength were intrinsically tied to its populatio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benefit of a polite culture was to enrich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 For instance, *The Fable of Bees*, Mandeville's most famous (and infamous) work, is subtitled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public welfare is the ultimate quest that runs through all of Mandeville's work in his quest to make England stronger and wealthier than other nations. This article thus argues that politeness serves as an essential tool for Mandeville to achieve his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and enriching the nation.

Keywords: Bernard Mandeville, polite culture, *The Fable of the Bees*, commercial society